

武汉资源信息

深度报告

武汉市信息中心

2005年7月4日

中心研究简报 (2)

“十一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将着重深度市场化
国内要进一步认清在CPI问题上的局限性
国内应加速发展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我国步入“高价工业化”时期
北京的经济适用房资本回报率是商品住宅的数倍

区域观察

〔4〕挤出“CBD泡沫”

宏观大势

〔7〕事业单位改革期待时间表

行业扫描

〔9〕中日东海石油之争——历史内幕版
〔11〕饭店展为何遭遇冷落？
〔13〕四银行浙江试验中小企业信贷

内部言论

〔15〕中国亟需建立“经济武器系统”
〔17〕城市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解决之道

政策措施 (20)

中部崛起在强、先、新、内上突破
北京工资基准线比去年平均工资增长11%
广电总局拟全国免费发放机顶盒

要闻参考 (22)

绍兴荣膺“国家节水型城市”
宁波亚洲最大浆纸企业完成试生产
江苏省首家农民投资性股份合作社诞生
价值导向将主宰长三角纺织业
江苏省苏中苏北发展提速
苏州：162个镇并为66个
南京地铁一号线开通观光游
“世界服装会展中心”落户苏州相城
国家环保模范城长三角占了四成
珠三角城市竞争力有所下降

中心研究简报**【政策措施：“十一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将着重深度市场化】**

日前，发改委学术委员常修泽披露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思路，即“十一五”规划中经济体制改革将体现出深度市场化、注重人性化、应对全球化三大特点。在深度市场化方面，一要向微观经济主体本身推进。应着力推进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改革，基本思路是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时大力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并按照体制创新的思路积极发展一批非国有制性质的企业（包括金融企业）；至于国有事业单位，应采取公共性、准公共性和营利性区别对待的方略分类改革。二是向生产要素市场推进。现在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要素市场双轨制”，引发了生产要素领域的“寻租”等严重腐败问题。三是向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推进，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由“经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从近年来宏观调控暴露出来的问题看，传统经济体制的劣根性及其惯性运作，比原来估计的要严重得多，这增加了体制转型的难度。四是向社会管理和政治体制推进。在注重人性化方面，改革要具有人文关怀就必须考虑民生问题，也就是“民生类制度创新”。它应包括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在应对全球化方面，要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学会把握国际规则的主动权，特别是围绕反垄断、反倾销、反补贴等建立一整套实现自我保护的制度安排，从宏观角度建立一套对外开放和保护国家利益的平衡机制。

【形势要点：国内要进一步认清在 CPI 问题上的局限性】

现行的 CPI 指标扭曲了国内的价格判断。国家信息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认为，国内的 CPI 指标有局限性。由仝锋执笔的研究报告认为，自中国新一轮经济扩张期以来，作为最终反映物价变化的指标，CPI 与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间的差距明显拉大，在反映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方面也存在较长的时滞。导致 CPI 局限性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受我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CPI 对经济波动的敏感性要弱于投资价格和原材料购进价格等其他价格指标。以 2004 年为例，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 9.5%，投资价格和原材料购进价格的涨幅分别为 5.6% 和 11.4%，对经济波动的反映更敏感和直观。与之相比，CPI 仅上涨了 3.9%。如果仅就 9.5% 的经济增长率与 3.9% 的 CPI 来说，就会得出我国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低通胀的发展态势，但事实上当年生产资料价格，农产品生产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上涨 13.6%、13.1%、6.1%，均明显高于 CPI 涨幅。第二，由于 CPI 不能反映资产价格的变化，特别是与居民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房价的变化，因此与老百姓的正常心理感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中国目前 CPI 的统计中，只包括商品和服务价格，不包括资产价格。但与其他商品不同，住房既是商品，也是资产，具有双重属性。房价的变化应该通过 CPI 中房租价格的变化体现出来，但在 CPI 统计的居住价格中，与房价有关的房租价格涨幅由 2002 年的 4.4% 到 2003 年的 3.5% 和 2004 年的 3.0%，逐年走低，与房价变动方向刚好相反。房价变化要想反映到 CPI 上，需要经过“房价 - 房租 - 居住价格 - CPI”这一传导过程，中间环节过多，难以对房价变

化进行准确的反映。2004 年居住价格在 CPI 中所占的权重仅为 13.6%，而居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到 2004 年年底已达到 1.6 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居民消费的 27%。

【学界观点：国内应加速发展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中国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环渤海湾城市群三大城市群，应该成为国家财富积聚的战略平台，并作为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开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这是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等数十名学者，日前在由中国市长协会主编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3-2004）》中的联合建言。

《报告》认为，中国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是在国家层面上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各类城市各自为政的线性发展思路，导致城市化战略仍然存在一个“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经济不活、小城市实力不强、小城镇总体不优”的困境。一个例子是，目前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 GDP 的贡献率明显偏低，只有 37%。相比之下，美国大纽约区、大洛杉矶区、五大湖区三大城市群的 GDP 总量占到了全美国 GDP 的 67%；日本大东京区、大阪神户区、名古屋区三大城市群的 GDP 总量达到了日本全国总量的 69%。为此，《报告》设计了中国城市化战略的“三维分布”制高点：培育三大城市群（面）；创建七大城市带（线）；发展若干中心城市（点），其中制高点的最本质体现，就是必须首先加速建设国家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报告》测算，中国城市化战略制高点一旦成熟与完备后，将有全国人口的 50%，将有全国 GDP 的 80%，将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90%，将有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95%在约占国土总面积不到 6%的地域上生成。不过，按这种思路，发展的

优先重点将是东部和南部城市群，在短期内将加剧资源向东南部的倾斜，造成区域差异拉大的现实。

【形势要点：我国步入“高价工业化”时期】

工业化始终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了一条低价工业化道路。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开始步入“高价工业化”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力要素成本上升。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将趋于上升，人力资源价格上涨，导致企业支付成本上升。二是技术成本上升。缺乏核心技术，“有品无牌”的多产多销难以获得高额利润，是中国制造的切肤之痛。因此，中国企业必须加大投入，增加职业的研发人员，寻求以技术研发为先导的发展。三是企业支付物流成本高。资料显示，发达国家平均物流成本是 10%，而中国平均物流成本则要高出一倍，达到 20%，中国企业要把 20%的运营成本投入到和物流有关的事项中。四是生产资料成本抬升。中国进入“资源有限”时代，在原材料和能源上依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原材料和能源涨价，导致企业支付的成本大规模上升。五是土地价格上涨。土地是数量管制的，土地已呈现紧张状态，要扩大生产，土地是很大的限制因素。应对高价工业化时期，企业的策略必须尽快从粗放型生产方式向集约型生产方式转变，打造知识和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否则就会在高成本的重压下关门大吉。

【形势要点：北京的经济适用房资本回报率是商品住宅的数倍！】

房地产“暴利”始终是个不变的话题，从开发商自己透露的信息来看，不少人还是低估了房地产行业的回报状况。李先生是 1996 年开始进入北京房地产业的，就他的经

验而言,北京多数楼盘的利润可以占到房地产价格的15%—25%。但这一数据仍不能令广大民众信服,作为一个富豪数量连年占到“富豪榜”40%的行业,这一利润率似乎显得有些太低了。李先生指出,造成这一错觉的原因,是人们往往混淆了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的概念。目前很多房地产公司真正投入的项目资本金仍然只占到总投资款的20%左右。李先生自己的项目总价格已超过40亿元,而他的公司注册资本仅为1.2亿元。如果按照他的

项目来计算,虽然楼盘的利润为20%,但资本本年回报率高达100%,资本总回报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00%,真可谓是一本万利!李先生透露,经济适用房的回报率比普通住宅更是高出数倍。普通住宅项目在前期运作方面的投入较经济适用房至少高出20%,而利润回报周期则少了2—3年,因此,资金运转速度的加快,造就了经济适用房巨大的资金回报率。

(责编/蔡进军)

区域观察

挤出“CBD 泡沫”

——首届全国商务功能区论坛综述

● 濮婕

CBD,正在成为中国的一个现代迷信——一个国际化城市不可或缺的新坐标;从商业角度看,它几乎成了聚宝盆的现代代名词;而从实践看,中国某些城市的CBD定位和建设显然偏离了其原创定义和意义

北京CBD、上海南京路、广州天河、杭州武林、重庆的解放碑……40多座中国城市正在建设或策划着自己的CBD。

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来说,CBD似乎集聚了与财富有关的种种梦想:最高档的写字楼,最昂贵的公寓,最出风头的建筑,还有最有钱的人和他们的最靓的车……

CBD,十足的舶来品。这个源自美国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在研究芝加哥市城市空间结构时提出的概念,原意是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翻译成中文就是“中央商务区”。在日益与国际接轨的中国,CBD正成为众多城市热烈追捧的新坐标。

论及对CBD的热衷度,城市管理者 and 地

产开发商似乎难分高低。因为从商业角度看,单就CBD这个概念,就先天注定了其近乎天价的土地出让金和楼盘售价。

但是,既然CBD最初只是起源于美国芝加哥的城市空间结构概念,那么它是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样板?什么样的中国城市适宜建设CBD?是否可以用一个模子拷贝不同的城市CBD?

6月17日,“首届全国商务功能区发展研究高级论坛”在北京隆重开幕。主办方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承办方则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CBD发展研究基地。建设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城市设计规划研究院、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还有来自北京、天津、辽宁、武汉等 CBD 的负责人，纷纷亮相论坛。

CBD 是什么——不是城市新区的洋名

目前，全国有 40 个城市正在研究建设 CBD；而有关研究机构摸底“CBD 泡沫”调查结果显示，一个城市若发展 CBD，首要条件是其城市 GDP 至少在一千亿元以上。照此标准，我国有资格建设 CBD 的城市微乎其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岳颂东说，建设 CBD 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城市化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建设部曾委托深圳的一家研究院调查全国的 CBD 建设情况，据说当时提出一个指标，就是城市的 GDP 不满 300 亿元的不要搞。但他本人觉得 300 亿元订得有点低，至少应在一千亿元以上；此外，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客观的标准——比如，世界 500 强至少应有一强在这里落户。如北京 CBD，这里集中了北京地区 70% 的涉外资源，其中 65% 的跨国公司的代表处和 80% 的豪华宾馆都集中于此，所以北京规划建设 CBD，属于水到渠成。

北京市城市设计规划研究院原院长柯焕章认为，如果按照狭义的 CBD 概念来理解，中国仅有香港、上海、北京等几个城市建设 CBD，显然远远不够，还应该有第三个城级或者第四个城级的商务功能区。部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都有建立中央商务区的必要和可能。但是，不同的城市，还要根据其城市功能、规模、经济实力、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最终设计其 CBD 个性。如沈阳的 CBD，区位优势、功能特征、建设规模等，具有比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而南昌市，在赣江“洪虎滩”新区做了一个 CBD 的规划，规划用地 3.55 平方公里，其中建筑

用地是 210 公顷，行政商务办公只占 49 公顷，不到十分之一，其余主要都是商业酒店等。这样的城市商务功能区就没有必要勉强叫 CBD，叫新城中心区更为合适。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在论坛上介绍说，最近两年，很多城市邀请他参加与 CBD 沾边的规划，很多城市把自己的商业街区、商贸流通中心和 CBD 放在一块。其实，商务中心区和商贸流通区是不同的，商业资源配置和银座、王府井是不一样的。

据了解，目前北京、上海、重庆等一批直辖市，已开始建设 CBD；武汉、南京、沈阳一些省会城市已开始起步；还有近二三十个城市正准备涉足 CBD。

如何规划 CBD——向曼哈顿学习

作为舶来品，CBD 对于城市发展还是具有多重功能，有积极意义，但从目前中国实践看，冒出了某些不良倾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岳颂东介绍说，CBD 的规划和建设周期是很长的，远不是搞一个楼盘、搞一个小区，三年五年就能成气候的。像东京的新宿，从上个世纪的 60 年代开始规划，80 年代初具规模，到现在三四十年了。一个比较成熟的 CBD，没有半个世纪是难以成型的。

因此，CBD 的规划者至关重要，规划必须有提前量考虑，不能人云亦云，人家怎么规划你也怎么规划。否则，等到人家成了规模、成了气候了，人家的功能也替代了你，你便成了多余。

他还特别欣赏美国曼哈顿 CBD 对于人脉延续的关注。曼哈顿 CBD 包括下城和中城两部分。下城就是国贸大厦，那里聚集了著名的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和证券机构，白天熙熙攘攘，但一到晚上，白领们都走了，门可

罗雀；中城就是百老汇、第五大道、克莱斯勒大厦、大都会歌剧院、豪华住宅区都在中城，一到晚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真正的不夜城在中城。

北京 CBD 管委会副主任常树奇介绍经验说，北京 CBD 属于旧城区内的新型开发区，拆迁改造任务与新建项目并存，土地权属复杂，政府可控的土地资源很少，面临巨大的交通压力，因此必须以规划引导发展。为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北京 CBD 管委会采用了国际征集的方式，向国内外公开征集北京 CBD 规划方案。在总结八个征集方案的规划思路基础上，经过多次专家论证，最终确定了北京 CBD 综合规划方案。

目前，北京 CBD 的规划建设项目共有 38 个，包括国贸三期、中央电视台新址、北京财富中心、北京银泰中心、北京电视中心等重点项目。截止 2005 年 3 月，已有 23 个项目开工建设，总开工面积约 540 万平方米。预计到 2008 年，北京 CBD 总建筑规模将达到 802 万平方米，其中写字楼竣工面积达 370 万平方米。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提醒说，国内建 CBD 要规避别人已经犯过的错误，不能说别人在成长过程中得过一回肝炎，我们也一定要在成长过程得一回肝炎。全世界的所有 CBD 建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也留下了很多城市化的遗憾。比如纽约、东京和其他地方，都有一个共同问题——过度密集导致的交通拥堵问题。近年来，人们还意识到 CBD 似乎更容易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如何建设 CBD——“一山不容二虎”

国内最早提出规划 CBD 的是北京，其历史已有 12 年。除北京之外，上海、重庆等一批直辖市，也已开始建设自己的 CBD。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CBD 发展研究基地秘书长蒋三庚认为，CBD 建设必须要关注企业生态群。所谓企业生态群，就是指若干个企业或者企业群在一定的生境条件下所形成的、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企业群体。对于 CBD 而言，无论是商务功能还是金融功能，除了主要的企业之外，还必须有相关的企业存在作为一种支持。如金融企业，它必须有会计、审计、律师事务所、投资公司给予支持；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商务功能区必须要有其他业态、业种，如影视、超市、休闲、餐饮等配套服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岳颂东认为，建设 CBD，千万不可多头投放，功能雷同。比如，青岛市南区搞一个 CBD，从未来看应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 95% 以上的银行都在那里，而且整个青岛市的银行存款，大头也在市南区，这是一个老金融区。但现在城北也要搞一个 CBD，一个副省级的城市就搞了两个 CBD。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城市也有苗头，像深圳，罗湖区是老区，也是当时的金融中心，被称为深圳的中环，贷款额占全市的 69.6%，外汇贷款占全市的 89.8%，外资存款额占全市的 74.8%，可以说 CBD 已成雏形。但深圳市政府后来又在莆田区搞了一个新的 CBD，几年过去了，既没热起来，也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他分析说，北京 CBD 也有雷同之嫌，朝阳区是最早的 CBD，但西城提出要搞金融街，丰台要搞总部经济，实际上都有 CBD 部分功能的雷同。一个中心还没有饱和，又开始搞功能雷同的其它中心，最后必然谁也吃不饱，既分散了财力，又浪费了资源，使 CBD 的功能稀释弱化。

(责编/李力韦)

宏观大势

事业单位改革期待时间表

● 李 琰

世界银行长达两年对事业改革的专题研究，引起人们对事业单位改革战略与紧迫性的再度关注

经历了 25 年的自发和局部探索之后，仍然没有人能够清晰地回答——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究竟到了什么阶段？下一步向何处去？时间表会如何安排？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经牵头对事业单位改革做过研究。在他看来，事业单位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到现在“连河对岸在哪里都还不大清楚”。

世界银行 2002 年始对事业改革进行专题研究。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认为：“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一样重要，但更加复杂。”

6 月 21 日，世界银行长达两年的研究报告终于有了结果。洋洋 4 万余言的报告《中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改善公共服务提供》，集合了各领域一流专家的智慧和努力，试图对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整体目标和战略方向进行重新思考。

此报告公布，引起人们对事业单位改革战略与紧迫性的再度关注。

共识与分歧

“事业单位”是中国特有的名词。1998 年，国务院的一个条例将其定义为“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粗略统计，目前中国的事业单位多达 130 万家，职工总数近 3000 万人，资产近 3000 亿元。

据了解，在世界银行此次调查报告之前，各方学者已就事业单位改革成立了多个高级别课题组。

这些来自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研究有一个共识，即不是所有公共服务都需要政府提供，因此要按照市场经济的思路对事业单位进行改革。而在改革的具体目标和实施方式上，以上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观点：一是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强调把事业单位“推向市场”，为此需要对现有事业单位进行重组和撤销，以解决事业单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弊端。二是认为，过去在公共服务领域进行的改革已经过度市场化；公共服务提供不能都推给市场，政府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相对于这两种观点，世行更强调中国事业单位的复杂性，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市场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而要具体观察每个事业单位所在服务领域“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才能判断应该交给政府还是交给市场。

分清服务领域至关重要。对此，该课题负责人、世行高级专家张春霖进一步阐释说，应当从其具体产品判断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然后据此进行分类管理。比如政府部门培训中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旅馆业务，完全可以市场化；而相应的专业培训，有的涉及国家机密或者具有较强专业性，则可以转由相关政府部门下属的培训办公室来处理。

与之类似，多数科研院所大量从事市场咨询业务，也可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承担的少量诸如制定行业标准之类具备公共

物品性质的内容，可以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委托进行。这样，就可避免从整个机构角度进行“公益”或“非公益性”分类的尴尬问题。

财政改革无从回避

很多人在谈及事业单位改革之初，习惯于将视线集中于事业单位的冗员庞大、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沿此逻辑，过去20年间事业单位改革的通行做法是“撤并”和“转制”，以及削减财政预算拨款，将事业单位“推向市场”。这种改革被称为做“减法”。

“减法”触及许多部门和人员的既得利益，必然引起震荡，因此广被关注。但实际上能够用“减法”剥离的，只是现有事业单位体系的外围内容，而非主体。

改革必须触及事业单位的主体部分，即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领域。依此，改革的要点和更为困难的，是如何构建一套能够有效地向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体系和机制。这又被称为“加法”。

“这两个方向，一个是‘破’，一个是‘立’。两者之间，后者的意义也许更为重大，也更难、更复杂。”张春霖说。

正基于此，世行报告提出，改革不可避免会对某些事业单位职工的工作、工资、奖金和退休金产生负面影响，但不大可能像国有企业改革那样，出现全国性下岗压力。正确的改革方向，应是建立一个既适用于事业单位职工、又适用于劳动力队伍的统一的全国性养老政策框架。

在重新界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角色的基础上，以制度“加法”而不是机构和预算“减法”为思路，设计事业单位改革措施，其最大的挑战来自对公共服务领域相关的财政制度的全面改革和重建。

“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否得到落实，归根结底取决于地方有无财力。这一点在基

层尤其明显。”张春霖指出，在贫困地区，甚至最优先的关键服务，如小学义务教育、农村基础技术服务以及疾病控制中心和类似的机构，也常因缺乏基本的资金支持而难以进行。2003年的SARS危机，就暴露出支出不足导致公共服务缺失所引发的严重社会后果。

对此，一个基本方略是改革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机制，明确政府在一些必要的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责任，保证公共资源分配的优先次序。改变过去以“养人”为主的软预算约束，变为以“做事”为目标的硬预算约束。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地方各级政府收入明显不足，又难以从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中得到任何帮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多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卫生等关键服务提供严重不足。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虑改善公共资金的纵向分配机制，建立政府间财政支付体系。张春霖认为：“国家通过财政手段干预公共服务提供，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责任，并以转移支付等手段支持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加强问责机制

提供公共服务不仅需要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加强监管亦是保证。

对具有强烈外部性特征的公共服务提供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关键在于公众、事业部门和政府三者间建立起一种三角形约束框架。国家发改委综合改革司副司长张丽娜提出了一个直观的比喻：“中国过去的事业单位体制中存在‘管办不分’的问题，政府既是服务的提供者又是服务的监督者；推行‘管办分开’改革，就是要在政府和公众这‘两角’中间再拉出一个角，这样就可以实现三角稳定结构了。”

随之而来的，还有更为复杂且具体的监管和激励机制问题。这涉及财政监管、人事制度、薪酬制度和社会表达机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与制度重建。整体而言，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可能是长期和渐进的，不太可能根据某一蓝图采取“大爆炸”式的改革战略。

世界银行的报告建言：鉴于改革的复杂性，中央政府需要认真考虑改革的组织、原则、计划和阶段划分；可以成立一个事业单位改革领导小组，直接在国务院领导下工作。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包括对事业单位进行统

计调查，获得关于事业单位的详细信息；制定总体改革战略，包括改革原则、阶段划分、时机选择和改革责任；准备法律法规草案和修改法律法规的建议；准备绩效管理的框架文件；协调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改革行动等。

“如果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事业单位改革 20 年来已经离开了此岸，已经行至河间。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搞清楚彼岸在哪里，以及踩着哪些石头过去。”张春霖说。

(责编/李强)

行业扫描

中日东海石油之争——历史内幕版

● 唐渊龙

中国有句话，“闷声发大财”，一点也不假。有关中日东海油气田争夺战上，中国就应了这句话。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叫做荒木正雄的日本人之遭遇。事情要从 1968 年说起。那一年，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发表考察报告，说东海大陆架下面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得知这一消息的日本政府，连忙于 1969 和 1970 年与东海大学合作对此地区进行了地质考察，果然找到了标志着石油蕴藏可能的“海相新第三纪沉积”。据当时的估计，这片地区大概蕴藏着价值两万亿美元、与波斯湾储量相当的海洋石油资源。要知道此时刚刚经历过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各国都对石油资源的开发格外重视。

荒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打算投身开发海洋石油资源这项有前途的战略投资的行列。1973 年他进入了日商岩井出资成立的东洋石油资源开发公司。

在日本要想开采石油，就需要日本通产省(相当于中国的商贸部+工业部)矿山局和能源资源厅的许可证，而荒木在申请执照的时候，被告知这片海域的开发，需要得到日本外务省(外交部)的许可。荒木找到日本外务省(相当于中国的外交部)，却被告知“现在是政治上微妙时期，你再等等吧……”。

这里有个时代背景。钓鱼岛争端从 70 年代初爆发，中国在 1971 年 11 月 30 日宣布钓鱼岛主权是中国的。而 1972 年 9 月，中日双方刚刚签署联合声明，荒木打算勘探开发的这片海域，则正是争议地区附近。有鉴于此，日本外务省明显是怕与还没有签署和平友好条约的中国为此发生争执，才拒绝发给荒木许可证的。

荒木碰上这样的外交纠纷，自然无能为力，事情一拖就是六年。到了 1978 年，日本终于如愿以偿地等到了与中国签订《中日友好条约》的一天，随即就派出巡视船试图霸

占钓鱼岛。但中方接下来的举动让日方大惊失色……数百条武装渔船竞逐钓鱼岛海域与日本巡视船对峙，一时间舆论哗然。此后才有邓小平提出的“将钓鱼岛问题束之高阁、等待有智慧的后人解决”等说法。

外交纠纷未了，荒木的梦想亦破灭了一次。这次荒木不会再傻到去等候那遥遥无期的日本外交部的批文了——等到下一代人，他可等不起。于是作为商人的他直接去找中国方面负责此类问题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从此开始了与中方长达十多年的交涉。其实早在那个时候开始，中日双方在政府立场上对这个问题的主张就针锋相对：日本主张以中日两国的中间线划分“势力范围”，而中国方面一上来就主张以“大陆架延伸”原则来界定双方开采的区域。

荒木这样的人所代表的“民间企业”，要在这样的政府立场对立的夹缝中求生存，必须要提出自己两不得罪的解决方法。荒木找到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首次提出了“那就让我们一起在日本方面提出的中间线附近共同开发好了……”，但当时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则不吃这一套，断然拒绝。

荒木毕竟是生意人，脑子活得多。既然这条路走不通，那就走走上层路线试试看？于是1991年趁中国副总理访问日本，荒木再次提出了“请让我们和中方一起开发中日中间线附近的海底石油吧”的要求。此后不久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领导就受命来到日本与荒木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经过多次磋商，中方终于表态，“可以考虑进行初步合作”。这对奔走十年的荒木来说，不啻是最妙的仙音。

但历史就是历史，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日方在私下里至今痛悔不已。荒木所在的东洋石油资源开发公司，在日本国内申请的开采区域只是中日中间线的南段部分，而北段

部分的开发权则握在日本石油公团手中。荒木跟中国方面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因此提出了“与中国的合作先从中间线南段开始”的申请；而石油公团则对此极为反对，声称“要合作就南段北段一起开始，否则就哪个也别开始干”。日本政府显然是接受了财大气粗的石油公团的说法，结果与中国方面合作开发的事情，居然就为此而耽搁了下来。

与此同时，中方的步伐却一点也没有因为日方的停顿稍有懈怠。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就开始用自己简陋的设备在东海海域勘探和试采；到了1992年，随着中国《领海法》的颁布，中方大大加强了在中日中间线中国一侧的海底勘探工作，随即成立了上海石油天然气公司来专门负责这一巨大工程的实施。日本方面的拖拉，使得我们没有了日本人资金和技术的合作，中方开始了国际招标、寻求国际协助的步伐；从此再也不用求日本人搞“合作开发”了。自此，中日民间机构的“合作开发”构想，正式划上了句号。

到了1994年，中方开始在平湖油田试采并取得成功，眼看着中方渐渐前进的脚步，荒木毫无办法，还是在日本政府政策的框框里一事无成。时间进入1998年，西湖凹陷中的平湖油田正式开采，并开始通过长达386公里的海底管线向上海供应天然气。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更大的油气田的开发：宋云亭、玉泉、天外天、春晓等也取得重大进展，到2005年5月，春晓油气田将正式落成并向国内输送天然气。

荒木们眼睁睁看着中国方面不动声色，却已是步伐轻捷地一路绝尘而去，一面痛恨日本官僚政客的“误国行为”。另一面作为商人也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和中国合作，才能免于被历史的快车彻底抛弃的惨剧。为此，荒木改为向政府机构呼吁，“不要再坚持中间线共同开发”的过时观点了，应该改为

“在日本主张的中日中间线”和中方主张的“冲绳海沟为界”之间的部分，双方“共同开发”。荒木清楚，以现在的情况而论。比中方提案所提出的这样好的条件，已经再也没有了。中方提出这样的和解方案，日本政府方面总是不能见好就收。要知道如果真的把这个争端拿到国际法庭去裁决，无论是中国提出的“大陆架延伸”原则、还是日本提出的“中间线”原则，似乎都有据可循，可时间是站在中国一方的。

写到这里，历史该告一段落了。其实，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没有机会合作，中方也屡屡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但日本政府从一开始起就没有合作的诚意，白白放跑了多次机会。

反观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大事宣扬，却在连贯的政策指导下逐步加强自己的实力，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到头来，如今日本连提从前一度得到的承诺的资格也没有了，可以说满盘皆输。按理来说，一个政府本来就该是协调下面的各方利益，在合理公平的前

提下与别人协商，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机会的；但如果政府被官僚体制所支配而无视同家的根本利益，或者被所谓的“民意”所驱使而不敢做出正当的选择，甚至拿所谓的民意来当作自己无能的挡箭牌，才会出现日本政府现在这个样子——欲进不能、欲退不甘、欲罢不休。

这两天日本方面终于首肯“愿意在东海油气资源上与中国合作”，不禁要问，不合作，又能如何？就算日方现在开始竞争性开发，谁人勘探、哪个开采、几时出油、气往何处运、在哪方液化、合算不合算？这一揽子事情、可都等着解决呢，不是夸口，中国政府这二十年脚踏实地才一一做好的事情，本绝不可能在一时半会解决。

日方居然还提出“有条件合作”。它居然要中方以公开这二十年勘探的数据为条件，它才肯“合作”。这样的咋呼，恐怕要招致的结果比十年前更惨重了。东海之争，其实争无可争的，日方要不是打算输得血本无归的话，赶紧“顺坡下驴”才是正道。（责编/孙炳生）

饭店业商机凸现 饭店展为何遭遇冷落？

● 赵法忠

6月17日，第二届中国国际饭店业博览会闭幕了。令人失望的是，本届展会现场比较冷清，观众不多，与饭店业日益火爆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让展商倍感无奈。

门前冷落车马稀

2005中国国际饭店业博览会是在饭店业获得大发展的形势下召开的。6月17日上午10点多，在“第二届中国国际饭店业博览会”举办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无论是在展示客房用品的展厅，还是在展示餐饮

用品的展厅，参观观众都少得可怜。

偌大一个富丽堂皇的客房用品展厅，只见到琳琅满目的家具以及相关的客房用品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展台的接待人员要么是围坐在桌旁聊天，要么是一个人偎坐在沙发里发呆。

在北京顺天信家具的展台，工作人员称，本次展会参观观众明显不足，并不是因为最后一天才这样。展览三天总共才有几十位询问者，谈不上有成交意向者。

几个展台规模较大的企业的回答出乎意料的一致。作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惟一专用家具的广东金凤凰家具(国际)集团此次展台面积非常大,特装做的也是近乎完美,走进展台,让参观者好像顿时进入了五星级酒店。但是,装修豪华的展台与稀稀疏疏的参观者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对这个场景,该集团总经理助理张先生面露无奈。

饭店业蒸蒸日上

据中国饭店业协会表示,目前中国饭店业发展迅速。就北京而言,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到来,北京将新建300余家星级饭店,平均每5天就有一家酒店项目在启动;同时,各大酒店在扩建、改建、更新改造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投入。

据悉,北京市80%的星级酒店(400余家)店龄都已经超过了10年,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和现实的市场需求,这些酒店都要进行一次常规翻新改造。到2008年,北京星级酒店将达到800家,客房13万间。相对于目前北京星级宾馆、酒店不足500家的现状,宾馆、酒店用品生产企业显然面对的是巨大的商机。

而对于上海来说同样具有极大的商机。随着2010年世博会日期的临近,上海的酒店业也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上海的涉外游客人数在1995~2004年的10年中每年以14.2%的速度实现增长。截至2005年3月,上海五星级酒店的平均入住率达到72%,平均房价为190美元。尽管2005年平均入住率与2004年同期保持同一水平,上海五星级酒店的2005年平均房价却引人注目地上浮了37%。更让人关注的是,来自欧美及东南亚的一些国际基金在京沪两地收购高端酒店项目,个别项目即将进入签约阶段。

相比北京和上海,作为三大城市的广州也不甘落后。4月30日,由国家旅游局批准

的广州天河第一家民营白金五星级大酒店皇冠假日酒店启动,酒店总投资超过8亿元人民币,有400多间客房,建筑总层数为41层。此举标志着广东酒店行业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相对于一线城市,中国的二三线城市饭店行业的发展也不可忽视。近几年,深圳已经成为继上海、北京、广州之后,中国饭店业第四大城市。其他如成都、大连、青岛、武汉、宁波等城市饭店业也在飞速发展中。

服务做实才是根本

展会作为一个行业的集中展示舞台,最能体现行业的兴盛与否。饭店行业与展会之间形成如此鲜明的反差,原因到底在哪里?承办单位之一北京中建华硕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饭店业协会供应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殷明照介绍,本次展会首次进行了“饭店用品推介会、采购交流联谊会”等各项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是展会更细致服务展商的重大措施。从组委会的新闻通稿中也看到,本届展会上,举办了“中国饭店协会供应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和‘现场采购与供应交流会’”,后者还预计将有酒店总经理、采购部门、工程部、餐饮部、客房部门负责人等400余人参会。

按理说,供应商专业委员会成立以及现场采购与供应交流会的召开都是展商高兴的事情。展商对主办方此举并无多大兴趣。“交流会举办时,我也去了,但只待了十分钟左右就离开了,没什么意思。”来自深圳长江家具有限公司的及先生态度很鲜明。

为什么会出现展会组委会积极倡导,而展商反响冷淡的局面呢?光明集团市场营销中心张先生表示,这个展会之所以举办的不是很让人满意,他感觉原因有两点:一是展会才举办第二届,主办方没有经验;二是展会主办方的服务做的不到位,虽然他们很努

力,但是很多方面不是展商所需的东西。建议主办方在今后举办时要切实站在展商需求角度考虑问题,只有真正为展商做好服务了,展会才能持续发展下去。

而来自东莞市新鸿实业有限公司的徐先生的表达更为直接,他说,因为企业位于东莞,所以广交会是必定要参加的展会,从成交量来看,这个展会当然无法与广交会相比,但他们之所以来北京参展,内心实际上是对

协会抱有极大的希望,希望协会能协助企业做好交易服务工作,但最终却不尽如人意。说到对这个展览下一届还会不会参展时,他表示,虽然本届展会很让人失望,但它毕竟还是中国饭店业协会举办的一个行业展会,只要主办方真正为展商着想,努力改进,他们还是要选择参加的,否则只有走着看了。

(责编/李力韦)

四银行浙江试验中小企业信贷

● 吴传震

最近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相继在浙江展开中小企业信贷试点,它们能够探索出一条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道路吗?

6月初,国家开发银行和浙江省台州市商业银行决定合作开展“微小企业融资”的试点改革,这是最近一个多月来,见诸报端的在浙江的第四例中小企业融资试验。之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浙商银行接踵宣布将在浙江进行中小企业信贷改革试点。

对民营经济大省浙江来说,这当然是个值得欣喜的信号,它表明困扰浙江100多万家各类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有望先行得到解决。

今年年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特别撰长文,专门谈“银行业对小企业的支持问题”,刘明康认为,用政府支持的办法来搞小企业很容易引起道德风险,导致血本无归,但银行怎样支持小企业,却有很大学问。

刘明康表示,针对小企业融资难,银监会将选择一家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东、中、西部有代表性的地区开展中小企业信贷试点。

在这种背景下,各家银行都加快了推进

中小企业信贷的步伐。有意思的是,各家银行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瞄准浙江,在浙江首先开展中小企业信贷改革试点。

国开行本土和西方两种方案并行试验

国家开发银行是一家政策性银行,6月9日,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信贷三处处长沈丹介绍,国家开发银行一直积极探索如何利用融资手段,来促进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以及支持“三农”,而中小企业贷款也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目前,国家开发银行的中小企业融资课题组已经完成了一个中小企业融资方案。

据介绍,这个方案的关键之处在于建立两个平台——一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平台和为贷款提供担保的平台。

具体的操作模式与在浙江一些农村地区进行的“信用村”建设有相似之处,就是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将中小企业组织起来,以一个区域内所有中小企业的整体信用为基础。每位中小企业成员都保证偿还贷款,并向其他成员公开自己的还款状况。此外,每

位成员还要交纳其贷款额一定比例的资金，以形成风险互保金，作为成员借款的担保。

通过这种安排，一方面企业获得了贷款，另一方面，银行也降低了风险。这个方案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在一些省份小范围试点。去年浙江，国家开发银行开始与浙商银行合作开展试点。

6月份宣布的这个“微小企业融资”方案，则是国家开发银行的一个引入国际经验的方案。

2004年10月，国家开发银行在北京召开了“微小企业融资国际研讨会”，向国内外专家征集意见。不久，世界银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东欧的试点经验引起国家开发银行的兴趣。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苏联解体、东欧转型后，为22个转型国家的小企业先后发放贷款40亿美元，目前贷款余额为18亿美元，贷款回收率达到99%，逾期30天以上的贷款只有0.6%。

去年下半年，国家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一起，开始在浙江寻求当地银行合作，将后者在东欧的经验引入。今年4月份，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的项目经理彭健就被派往保加利亚，和世界银行的专家一同工作，学习他们的经验。

世界银行的方案一大特点是可复制性强，先后被复制到欧洲、非洲许多具有不同金融环境的国家，都顺利存活。

刚回国的彭健接受采访时表示，世界银行方案的核心是将信贷产品细分，从60万欧元（约630万人民币）到50欧元（约525元人民币）的贷款业务，银行都做，另一个原因是有一套成熟的信贷员激励与约束机制，具体业务由信贷员全权负责，信贷员需要详细了解贷款对象，信贷员的收入与贷款挂钩，其发放贷款也要承担责任。

浙江农行方案：允许保证担保

中国农业银行在浙江试点，是浙江省分行主动请缨的结果。5月初，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得到农业银行总行的同意之后，选择有30万家中小企业的温州开始试点。

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向记者介绍，温州市农业银行是当地存贷款总额最大的银行，去年达到了700多亿，有3000多家客户，但大多是销售收入在500万以上的企业，众多的小企业并没有被囊括进来。

这种情况对温州农行今后的发展不利，为了培养潜在的优良客户，他们开始探索小企业信贷业务的改革。

根据温州农行小企业信贷业务试点工作方案，农业银行将在多个层面，增加对小企业的扶持。

首当其冲的是简化了小企业贷款操作流程，将首笔新增贷款的发放时间从一个月缩短到十天。同时下放贷款审批权，把单户信贷余额在200万以下，单笔信用金额在100万以下的小企业短期信贷下放到县级支行，有些权限基层分理处就可以决定。

最具有意义的是，允许以保证担保方式开展小企业贷款。所谓的保证担保，就是第三方以信用替另一方担保贷款，并没有实际资产抵押，实际是两个单位的信用叠加，是一种信用贷款。这种方式由于对信用度要求很高，之前银行很少采用。

这种新的担保方式，还同时在杭州、嘉兴、台州、绍兴和金华试点。

虽然农行的试点方案有许多闪光点，但今后大规模推广时却可能受到制约。

曾在绍兴市担任上虞支行行长的周波对基层情况比较了解，他介绍说，目前浙江农业银行一个公司部的客户平均只有15家到20家，信贷经理缺乏是普遍的问题。农业银行总行要求将信贷人员的比例提高了20%的目标一直没有实现。这可能会影响中小企业

业务的开展。

为什么是浙江

浙江是一个中小企业为主的省份，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相对突出。这次，三家银行选择试点的杭州、宁波和温台地区都是中小企业和民间金融异常发达的区域。因此，在浙江试点，对其他地区，具有示范意义。

对于这点，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史晋川深表赞同，他说：“浙江的问题是先行的问题，将来各个省都会遇到。”

史晋川一直研究浙江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他对各家银行在浙江的试点十分关注，他认为，各家银行的动作，将使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不过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大银行开展小企业业务，始终会难以解决彼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史晋川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根本之道是开放金融领域，成立具有草根性的中小金融机构，让这些机构与中小企业很好的互动。另外要鼓励

和规范民间融资行为，让它们从灰色变为白色。

浙江已经有一些地方银行，在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台州市商业银行、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等。6月初，彭健去台州市商业银行调研时，发现台州市商业银行的信贷员激励和约束机制比世界银行的做法还完善。

这些与浙江金融业开放的大背景有关，浙江银行业的改革也走在全国其他省市的前面。从2002年开始，温州等地的城市商业银行已经实现民营化。近两年，萧山等地的农村信用联社纷纷转变为民营控股的农村合作银行。

目前，各家银行都拿出了自己的试点方案，至于效果怎样，能否趟出一条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道路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责编/李强)

内部言论

中国亟需建立“经济武器系统”

把经济作为武器的始祖是中国人。春秋战国时的越国曾一度被吴国占领、奴役，为了复仇越国假借饥荒向宗主国吴国借谷种，接着挑最好的谷种煮熟后归还吴国。吴国用这批种子耕种，颗粒无收，国力下降，越国乘机成功复仇，灭了吴国。这是首例有史记载的把经济手段作为武器的例子。

经济武器发展至今，其功能已超越传统武器所能涵盖的功能。最厉害的核武器也只能起摧毁和消灭敌人作用。而经济武器杀人于无形，摧毁国家于顷刻之间。而且攻击者还可获利，增强自己的实力。俄罗斯就是明显例子：它从可以跟美国抗争的超级大国，到现在一蹶不振，成为想插手中东事务都被

美国讥笑的国家。其中变化的原因就是遭受经济武器的攻击，由此可见经济武器的威力是怎么样的；这是核武器不能比拟的。

说起经济武器，当然要谈论经济武器的频繁使用者——美国。清楚和明白美国经济武器的功能和效用，有利于我们减免可能受到的伤害。美国常用的经济武器有：金融(包括货币、汇率)；石油(包括生产控制、价格控制、销售控制)；贸易(包括制度、政策、禁运、制裁等)；投资(附带条件、控制别国经济主脉)等等。反正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达到破坏别国或者是自己可以得利的手段，美国都会使用。下面看看美国最主要的经济武器。

金融作为最主要的经济武器是美国经常使用的，并经常通过这种手段来掠夺别国的经济成果。世界贸易需要中间的结算货币，由于美国超大的经济规模和超强的国家实力，自然演化而成了以美国货币为基准的国际货币结算体系。而美国就利用这样的地位来掠夺别人。手段如下：

第一，金融风暴或金融危机。大家知道社会财富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为什么金融风暴后就会损失百分之几十呢？国家的财富是以本国的货币来计算的，拿泰国举例。泰国在 1997 年金融风暴前的外汇储备是三百多亿美元，而即将到期的外债却超过了政府的外汇储备。这时只要几百亿的美元就能把泰国经济击垮，而美国的基金却能调动成千上万亿的资金；可想而知一个小经济规模的、只有近两千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系怎么经得起大量投机美元的冲击。投机者大量抛出的泰国货币和资产是泰国政府一时所不能承受的，在虚假供求情况下，泰铢对美元理所当然的下跌，引起金融风暴。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整个东南亚经济危机所损失的财富到那去了？虽然原因复杂，可是一定不可能全都凭空消失。道理是这样的，泰铢和美元的比率原来是 24 比 1，可是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投机资金可以发起对泰铢的冲击，泰铢与美元的比率变为 48 比 1。原来泰国一斤荔枝卖 24 铢可以换回一美元，可是在贬值后就要两斤荔枝才能换回一美元。就这样整个东南亚的财富就大量流向美国。大家看美国年年逆差，可是在经历世界各地的几次金融风暴之后美国就神奇的从 3000 亿财政赤字到克林顿下台时的财政盈余 1270 亿美元，而且这不是通过什么节衣缩食的措施来抵消债务的。

第二，汇率调整。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广场协议”，美国在日本拥有 1000 亿美元外汇时逼迫日本签下协议，同意日元升值，一下

子就赖掉了 500 亿美元的债务。直接导致日本企业因为日元升值而加大出口成本，产品竞争力降低，造成日本十多年的经济停滞。现在又要逼迫中国调整汇率。事实上美通过操控汇率获利，大家一目了然。

第三，货币发行，这里指纸币发行。由于成百年来人们对美元有偏好，使得世界各国人民除使用本国货币外还兼使用美元，使得美元纸币在世界上流通。美国不费力地通过出口纸币就能换回实际的物资。而美国对纸币的回流控制相当地严格，海关规定带一万元以上的美金入境就要申报，否则当成走私处理。美国因为经常通过货币手段获利，害怕懂经济的人对他们的数据进行分析，因此货币发行和相关的各种统计数字成为了美国的绝密资料。

第四，货币基金组织。美国经常通过货币基金组织假借帮助别人，给人贷款，顺便提出各种经济、金融的改革措施。在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很多的国家更加困难。阿根廷就是明显的例子。还有土耳其、巴西、孟加拉，阿尔及利亚等无一不是在货币基金组织的有条件帮助下，陷入危机的。

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经济规模巨大，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经济武器系统。如果不作通盘考虑，建立自己的经济武器系统，无异于“孩童怀宝于闹市”。像美国这样的，善于利用经济武器的同家，肯定会见财起意。我们还需自强，有防范意识，才能使美国打消歹意。老是见招拆招，疲于应付，不应是聪明中国人的做法——凡事预则立。

在空白的条件下，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经济武器系统，犹如刚建国要建立自己的国防力量一样艰难。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优良传统不能丢。现在亟需把经济手段作为武器来考虑并建立系统。这需要